

以“五一”假期广东“潮汐车道”为样本 深入解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理响广东·马院院长谈

编者按：

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

即日起，《羊城晚报》理论版推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响广东·马院院长谈”专栏，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访谈。

栏目策划：温建敏

栏目主持：景瑾瑾 李妹妍

本期访谈嘉宾



关锋：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唐士红：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节假日高速出行，“堵”往往是群众最直接的痛点。今年“五一”假期，广东在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推行“一条路全链条”治理模式，科学设置“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潮汐隧道”，以动态调配道路资源的方式破解节假日“堵局”。

从春运期间清远“交警带头逆行”获全网点赞，到“五一”假期全省多条重点路段实施“潮汐车道”，这些看似细微的治理创新，折射出怎样的价值坐标？本期“理响广东·马院院长谈”，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学者，以“五一”假期广东“潮汐车道”治理模式为样本，深入解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

羊城晚报：传统管理思维往往强调按章办事，而广东“潮汐车道”根据交通管理需求与时段性交通流特征动态分配道路空间，让群众合法“逆行”，这体现了怎样的政绩观？它与过去的管理逻辑有何本质分野？

关锋：这体现的就是正确政绩观。202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广东“潮汐车道”的做法，“一条路全链条”治理模式，贯彻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传统管理思维强调按章办事，当然有其合理性，可有效预防工作上的主观主义、随意性，防范诸如人情、关系等外在因素干扰。但切记不能本末倒置，按章办事最终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的。若抱有“不出事就行、无过即是功”的错误政绩观，按章办事就会沦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些党员干部因之墨守成规而不敢不愿不会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唐士红：“潮汐车道”看似只是移动一道护栏，打通一条通道，只是交通管理上的“微创新”。但实际上它折射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的深层逻辑，是正确政绩观最朴素、最直观、最生动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正确政绩观说到底就是要

为民造福。

广东“潮汐车道”看似是物理空间上的微小改变，实则是管理逻辑上的关键一跃。“潮汐车道”的推行不搞大拆大建，不靠人海战术，不回避风险，体现的是在精准施策基础上的勇于担当。综观“潮汐车道”实施的整个过程，没有惊天动地的大造声势，也没有光鲜亮丽的“数字政绩”，但每个细微之处都体现出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精准回应，以及对城市治理细节的精益求精。这种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着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的做法，是为民造福最有力的表达，最能检验政绩观的成色。

羊城晚报：从年初清远“交警带头逆行”火爆全网，到如今广东在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推广“潮汐车道”，这种由点及面、从“解决一个堵点”走向“破解一类难题”的扩散逻辑，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何启示？

关锋：这种由点及面、从“解决一个堵点”走向“破解一类难题”的扩散逻辑，既坚持问题导向，做到从客观实际

出发、实事求是，也遵循了人类对事物认识的基本规律，即从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从个性到共性），还尊重了事物发展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统一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的做法很好地体现和满足了正确政绩观的内在基本要求。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但真抓实干绝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更不是胡干蛮干，离不开科学的思维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良好业绩”。

唐士红：广东在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推广“潮汐车道”，离不开交警、交通运输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等各环环节的协同作战。如果只靠个人、个别部门单打独斗，也只能是一时之举、一地之效，难以复制、难以推广，也很难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不可否认，基层一线干部直面民生痛点，敢于打破常规、为民担当，这是治理创新的源头活水。没有一线人员的敢闯敢试、主动破局，就难有治理模式的创新。但创新模式要真正落地生根、常态化运行并惠及长远民生，要靠制度化的协同与合力。制度化的协同与合力，能将零散的基层创新提炼成标准范式和工作流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不因人事变动而中断、不随舆论热度而降温，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同时，这一创新举措也告诉我们：正确政绩观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在“愿不愿为群众多费一点心思”的坚守中，体现在“能不能协同发力解民忧”的担当中。

这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案例。真正最优的管理，并非冰冷的规则，而是藏在细节里的温度。规则的本质，是为了保障民生，而不是束缚民生。在节假日拥堵的特殊场景下，因地制宜、适度变通、精准施策的治理模式，比任何空洞的口号都更有力量，也更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

羊城晚报：有观点认为，真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是靠某个人或某个部门的“英雄主义”，而是依靠制度化的协同与合力。您怎么看？

关锋：这种观点具有合理性。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的实践中所遇到的事情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很复杂，正确把握问题和做出正确决策，需要坚持群众路线、群策群力，决策的科学化和

民主化密不可分。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这项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突出重要性。

有些工作任务和待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很复杂，是因为牵涉到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单位，需要它们密切合作，各负其责而又共同决策、联合施工、联合督查，才能完成任务或有效解决问题。健全协同工作机制非常重要。靠某个人或某个部门的“英雄主义”，也许一时有效，但长久必定出问题，很多“好心办坏事”现象就因之产生。

唐士红：广东在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推广“潮汐车道”，离不开交警、交通运输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等各环环节的协同作战。如果只靠个人、个别部门单打独斗，也只能是一时之举、一地之效，难以复制、难以推广，也很难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不可否认，基层一线干部直面民生痛点，敢于打破常规、为民担当，这是治理创新的源头活水。没有一线人员的敢闯敢试、主动破局，就难有治理模式的创新。但创新模式要真正落地生根、常态化运行并惠及长远民生，要靠制度化的协同与合力。制度化的协同与合力，能将零散的基层创新提炼成标准范式和工作流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不因人事变动而中断、不随舆论热度而降温，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羊城晚报：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在实际工作中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如何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

关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核心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牢记“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定要站稳人民立场，牢记初心使命。

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为民办实事，是“实事”和“好事”的有机统一。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理论上讲都是“好事”，好事一定要做实，否则有可能变成坏事。这要求党员干部一定

要认真调研，搞清问题真相、把握问题实质，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科学决策、运用科学方法有的放矢，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决不能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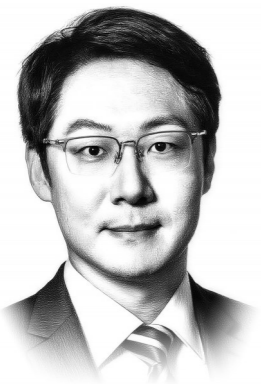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不能有脱离具体历史实际大而化之的冲动，进而急于求成、耽于幻想一步登天。一是切记“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二是切忌“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对于重大疑难问题，要“着眼长远谋定而后动”“有足够的历史耐心”，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思想境界。

唐士红：政绩观，是从政者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涉及“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政绩观之问是初心之问、使命之问，也是时代之问、实践之问。政绩观的取向，关乎从政者自身成长，影响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更关乎人民群众福祉的实现。新征程上，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必须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过硬实绩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一是坚持人民至上，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也是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标尺。二要把握成事之道，以真抓实干创造过硬实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靠实干。三是强化责任担当，勇于攻坚克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善于攻坚克难，面对难题要敢于挺身而出；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开拓工作新局面。四是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方面要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再明白群众急难愁盼的“靶心”；另一方面要按规律办事，在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决策，摒弃主观臆断、盲目蛮干。

两业协同 前沿思辨

□刘思源 何帆



刘思源

广东两业协同发展的总体态势与主要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广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制造强省战略积极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取得显著成效。

产业规模优势突出，融合基础持续夯实。202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3.0%，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7%。目前，广东已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智能家电、软件与信息服务、汽车、新能源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机器人谷”、广州黄埔、佛山北滘、东莞松山湖、珠海高新区等先进制造集群加速崛起，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在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等领域呈现深度融合态势。2026年一季度，全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1.6个百分点。

平台支撑能力增强，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截至2025年末，广东已有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1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省级工业设计研究院2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513家，工业设计平台覆盖制造业主要行业。《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新增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60家，新推荐培育不少于30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创新生态持续

锻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两业协同的现实基础与实践路径

优化。广东先后出台促进两业融合发展的系列政策文件，从产业融合、数字化转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构建两业协同政策框架。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于2025年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位居全国首位，为两业协同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生态支撑。广州—佛山—东莞等率先开展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建设，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融合创新模式。

广东两业协同发展面临的深层挑战

广东两业协同发展已进入深化阶段，但深度融合仍面临诸多结构性障碍。两业融合层次尚浅，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深度不足。一是服务型制造渗透率偏低，大量制造企业仍以产品制造为核心业务，尚未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多数企业向产品加服务模式转型处于起步阶段；二是产业链上下游制造与服务环节衔接不畅，研发设计、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与制造环节存在脱节，协同效应尚未充分释放；三是区域间两业融合水平差异较大，珠三角核心区两业融合程度相对较高，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受产业基础和人才储备制约，两业融合存在滞后。

政策支撑体系分散，跨部门协同与制度供给欠缺。一是两业融合涉及工信、发改、商务、科技等多个部门，现有政策分散于各部门单独制定，缺乏系统集成的融合型政策框架，政策协同效应不显著；二是融合型新业态的监管制度存在滞后性，共享制造、平台化制造等

新模式面临准入标准不明确、统计分类不清晰等问题，制约创新活力释放；三是现有财税金融政策对两业融合的针对性支持不足，制造企业拓展服务业务面临税制不衔接、融资渠道单一等实际障碍。

平台能级有待提升，数字化融合基础设施有限。一是工业互联网平台整体能级不够高，具备行业级数据整合能力和全链条服务能力的平台数量有限，多数平台仍停留在信息发布和基础对接层面；二是公共服务平台覆盖面不足，面向中小制造企业的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金融等专业服务平台供给缺口较大，中小企业获取高质量生产性服务的成本偏高；三是数据要素在两业融合中的驱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制造与服务环节的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机制不健全，数据孤岛现象制约了深度融合进程。

融合型主体数量偏少，龙头企业与复合型人才双重短缺。一是具备两业融合集成能力的龙头企业和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数量有限，难以对产业链上下游形成有效带动；二是专业化生产性服务机构规模偏小、服务能力偏弱，部分领域存在低端化、同质化竞争，难以满足制造转型升级的高端服务需求；三是兼具制造业知识和服务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较为短缺，现有教育和培训体系难以适应两业融合对跨界人才的迫切需求，成为制约两业协同发展的关键瓶颈。

推动广东两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应对上述挑战，建议从融合工

程、制度创新、平台矩阵、主体梯队四个维度系统性发力，推动广东两业协同发展进一步取得实质性突破。

实施全链条两业深度融合工程，推动制造服务一体化发展。一是打造场景化融合示范带，以珠三角为核心，在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制造等重点行业打造一批两业融合标杆项目，推动制造企业由单纯产品供给向产品加服务综合解决方案供给转型；二是推广服务型制造新业态，支持制造企业开展总集成总承包、定制化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等业务模式创新，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嵌入高附加值服务；三是建设跨区域两业融合协作网络，建立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协作机制，以服务外包、技术转移缩小区域间的两业融合差距，推动全省两业融合水平均衡提升。

构建两业协同制度创新体系，完善融合型政策工具箱。一是建立跨部门统筹机制，出台两业融合专项意见，统一融合型企业认定与统计标准，打破部门政策壁垒，实现一套标准、精准支持；二是推行新业态“沙盒监管”，在广州、深圳等试点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明确共享制造、平台化制造准入规则，建立容错与动态调整机制；三是完善财税金融支持体系，设立两业融合发展专项资金，创新服务型制造企业的融资担保和知识产权质押模式，解决制造企业拓展服务业务的融资难题。

打造高能级两业融合平台矩阵，强化数字底座与公共服务支撑。一是实施工业互联网平台能级提升计划，培育一批具备行业级数据整合和全链条服务能力的平台，推动平台由基础对接向深度赋能升级；二是建设面向

中小企业的生产性服务公共平台集群，整合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金融等服务资源，降低中小企业获取高质量服务的成本门槛；三是构建两业融合数据要素流通体系，制定统一的制造与服务数据标准，探索建立数据确权、定价和交易机制，以数据驱动两业深度融合。

培育壮大两业融合多元主体梯队，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生态。一是实施链主企业培育计划，遴选龙头企业向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带动产业链中小企业协同融合；二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质扩容，引导服务机构向高端化、专业化发展，破解低端同质化竞争，打造与制造集群适配的服务生态；三是构建跨界人才培养体系，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鼓励高校开设交叉学科，建设实训基地，推行校企“双导师”制度，从全球引育复合型优秀人才，破解人才瓶颈。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和制造强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锻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生要求，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战略选择。广东要充分发挥产业基础雄厚、创新资源富集、开放程度领先的综合优势，以更大力度推动两业协同发展，争取在产业融合模式创新、制度供给优化、平台能级提升和主体梯队培育等方面率先突破，为全国探索两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广东力量。

作者简介：刘思源，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工商管理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双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帆，华南理工大学商业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版头像绘制 蔡红)